

# 《乐记》作者问题新论

肖磊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乐记》一文, 囊括古今言乐之道, 现在多被看作是美学和音乐美学的经典, 或者被看作是“先秦的社会学”。关于《乐记》的作者, 自古以来争论纷纷而无定论。从六经的含义及其流传入手, 从学术背景上对《乐记》的作者问题进行深化, 可知该问题的争论可能是一个难以有结果的结果, 而以“治道”为中心要义对《乐记》思想进行挖掘和整合, 才是最重要的。

**关键词:** 乐记; 六经; 治道; 公孙尼子; 河间献王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5-0035-05

现存《乐记》为《小戴礼记》的第十九篇。郑玄在《礼记》中注道:“乐记者, 以其记乐之义。”《汉书·艺文志》云:“黄帝以下至三代, 各有当代之乐名。孔子曰:‘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也。’周衰礼坏, 其乐尤微, 以音律为节, 又为郑、卫所乱, 故无遗法矣。汉兴, 制氏以雅乐声律, 世为乐官, 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已, 不能言其义理。”然而在汉宣帝之时, 《小戴礼记》中便收录了“记乐之义的《乐记》一篇, 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乐记》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 争论很多, 主要集中在两种看法上, 一说认为《乐记》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公孙尼子, 二说认为《乐记》是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一批儒生采集编撰而成。还有人猜测是汉代的杂家公孙尼, 论证不多, 故不特列。

## 一、关于《乐记》作者的两种主要说法

### (一) 作者为公孙尼子

#### 1. 证据

第一, 两处直言《乐记》作者是公孙尼子的史料。

《隋书·音乐志》存录了沈约对梁武帝的《奏答》, 其中有“《乐记》取《公孙尼子》”一句。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有人猜测张守节此说是根据皇侃, 而皇侃与沈约是同时代的人。

第二, 两处言公孙尼子身份的史料。

《汉书·艺文志》载曰:“《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列于诸子篇的儒家流, 其后注明“七十子之弟子”。

《隋书·经籍志》中也有《公孙尼子》一卷, 列在儒家, 注明“尼似孔子弟子”。

第三, 三处疑似有关公孙尼子的史料。

《韩非子·显学篇》论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 提到其中一派是“孙氏之儒”(古代“孙氏”与“公孙氏”通用)。

汉代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提到公孙尼子之徒论性情“颇得其正”。

晋代陶潜《圣贤群辅录》进一步讲了韩非子讲的儒家八派, 指出了各有所长, 如“孟氏以传书为道”, “漆雕氏以传礼为道”, “仲梁氏以传乐为道”, “乐正氏以传春秋为道”, 其中有“公孙氏以传易为道”, 为“洁净精微之儒”。<sup>①</sup>

第四, 《公孙尼子》已失传, 两处其他著作对它的辑录, 与《乐记》文字基本相同。

唐代徐坚所编类书《初学记》记载:“公孙尼子论曰:‘乐者, 审一以定和, 比物以饰节。’”现存《乐记》中有:“故乐者, 审一以定和, 比物以饰节, 节奏合以成文。”一句。另外《荀子·乐论》亦有:“故乐者, 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

唐代马总《意林》中辑有《公孙尼子》一卷, 共六条, 其中一条“乐者, 先王之所以饰喜也, 军旅者, 先王所以饰怒也。”现存《乐记》中有“夫乐者, 先王之所以饰喜也; 军旅鈇钺者, 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另

外《荀子·乐论》亦有：“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缺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

## 2. 受攻击处

第一，《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中记载了“《乐记》二十三篇”，又在《诸子略》儒家流中记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如果说《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似乎说不过去。

第二，通过《乐记》与《吕氏春秋》《易经》《荀子·乐论》相同和相似文字的比较，试图论证《乐记》抄袭这些书，从而《乐记》的产生要晚于荀子，作者自然就不会是孔子弟子公孙尼子，而是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儒生编纂而成。

第三，试图说明沈约《奏答》中“《乐记》取《公孙尼子》”一句话不可靠。<sup>②</sup>

## (二) 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

### 1. 证据

河间献王刘德的身份比较明确：汉景帝刘启次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河间是今河北省献县一带，献是刘德的谥号。

《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刘氏不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漱以益微。”

### 2. 受攻击处

第一，《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渐以益微。”

这里出现了两种《乐记》：一是河间献王作的《乐记》，由王度授给了王禹，王禹在汉成帝时献出《乐记》二十四卷；二是刘向受汉成帝之命校书，得到与王禹不同《乐记》二十三篇。

第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记载“乐”有六家，分别是“《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似乎表明刘向校书获得的二十三篇《乐记》正是此处的《乐记》二十三篇，而王禹所献的二十四卷《乐记》是此处的《王禹记》二十四篇。《王禹记》已经失传，而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有十一篇因被收入《小戴礼记》而保存至今，跟河间献王无关。

## 三、《乐记》成书前的学术背景

### (一) 背景一

《庄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备乎！”“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也就是说六经是古代学习共同的典籍，而且是一个完备的治世知识体系，这些典籍由王官守护，因此“学在官府”。周朝衰落，王官失守，六经四处散落。此时王官之中的乐官也四处流散，如《论语·微子》里便有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大师、亚饭、三饭、四饭、鼓、播鼗、少师、击磬都是乐官之名，在《周礼》中都属于春官大宗伯之属，大师之职乃是“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sup>③</sup>皆文之以五声，<sup>④</sup>皆播之以八音。<sup>⑤</sup>教六诗，<sup>⑥</sup>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之音。……”这些乐官本来都是由周公创立的鲁国的乐官，结果散落到齐国、楚国、蔡国、秦国，河内、汉中、海岛各处，他们的知识本来都是王者治世之道的一部分，结果都零碎散乱地流散各地，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知识必然在当地有所传播。《左传·昭公十七年》里记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sup>⑦</sup>

### (二) 背景二

私学出现，诸子兴起，各执一端，局而不通。《庄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亦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由此可知，诸子对于六艺之“乐”也是零零散散各有所得，形成各自的理解。比如既有儒家提倡的礼乐教化，又有墨家提出的非乐思想，还有老子阐发的大音希声的道理。

### (三) 背景三

六经散落，道术缺废，于是便有好学访求、收集整理者。孔子一生学而不倦，四处求访，加上鲁国本有的师资、典籍以及习俗，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读易经，集其六艺之大成；另外孔子诲人不倦，《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sup>⑥</sup>这里的六艺可能指礼、乐、射、御、书、数这“行之六艺”，也可能指诗、书、礼、乐、春秋、易这“理之六艺”，然而此处用“身通六艺”，很可能是指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孔子读易经、作春秋是晚年之事。此外，即便是指“理之六艺”，“身通六艺”也不是说七十二子像孔子一样精通六艺、皆有所成，只是说于六艺皆有所习得，亦能贯通，但精通的也许是其中的一二艺，七十二子各有所成，因此各有其传。《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乐教之不易，并非能记铿锵鼓舞便能成就。《汉书·云》：“周衰礼坏，其乐尤微，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矣。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已，不能言其义理。”《乐记》曰：“乐也者，非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圣贤群辅录》讲有八儒，其中有“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而南朝的沈约会把《乐记》和以传易为道的公孙尼子拉上关系，却没有提到以传乐为道的仲梁氏。大概是因为仲梁氏“颇能记铿锵鼓舞”，而公孙尼子“能言其义理”。另外汉代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儒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难论也。”<sup>[1](966)</sup>可见公孙尼子善于论说性情，而性情正是制礼作乐的依据，《乐记》中就说道，“乐也者，情之不可易者也”，“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因此，以传易为道的公孙尼子应该深知乐之义理，《汉书·艺文志》里也讲过，易经为其他五经之原。另外孔子一般教人以诗、书、礼、乐，晚年才读易，并且盛赞易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公孙氏在儒门八派中以传易而闻，可见其深。

### (四) 背景四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汉书·艺文志》）

而《礼记正义》对这段也做了引用，但所载稍有不同：“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博古，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事也。”

《汉书·艺文志》中的“以作《乐记》”在《礼记

正义》的引用下成了“以作乐记事也”，可能是为了表明区别不致混淆，因为《汉书·艺文志》既载有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二十三篇又有出自王禹间接得自河间献王《乐记》的《王禹记》二十四卷，既然已经改称《王禹记》了，再说河间献王作《乐记》容易使人混淆，于是把河间献王“作《乐记》”改写成“作乐记事也”。

另外《礼记正义》中对“乐记”的解题是：“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或许是为了表明河间献王所采集的以乐事为主（跟后面的“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一句也正好符合，因为制氏正是“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已，不能言其义理”），而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更多地涉及到乐义。

### (五) 背景五

汉宣帝时，《小戴礼记》成书，其中第十九为《乐记》，十一篇，保存至今。

《汉书·艺文志》中讲到，周衰之时，诸侯都想冲破礼法的制约，又害怕人们议论，于是把礼的典籍都加以除灭，到孔子的时候，礼已经不周全具备了，而到了秦朝更是大坏。汉朝时，鲁高堂生传授了《士礼》十七篇（也就是今天所见的《仪礼》十七篇），到汉宣帝的时候，最明白礼的是后仓，戴德、戴圣、庆普都是后仓的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汉代把《士礼》当作礼经，而《礼记》则是附属于《士礼》，从各个方面阐述礼之义。《汉书·艺文志》曰：“《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此后有两种说法：

一说出自东汉郑玄，认为这百三十一篇《礼记》由叔侄二人戴德和戴圣分别传授，戴德传授 85 篇，是为《大戴礼记》；戴圣传授 36 篇，是为《小戴礼记》。

另一说来自《隋书·经籍志》，认为 85 篇《大戴礼记》是百三十一篇《礼记》的选本，49 篇的《小戴礼记》又是《大戴礼记》的选本。

### (六) 背景六

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汉书·艺文志》）

河间献王有没有见到《公孙尼子》一书，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史料可以表明。但是刘向应该在校书中见到了，因此《汉书·艺文志》中才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的记载。刘向的《乐记》和王禹的不同，究竟不同到什么程度，只是版本的不同，还是内容上就有很大差异？已经难以考证出定论。

### (七) 背景七

“故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馀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三十四卷，记无所录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别录》十一篇，馀

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

这里说《小戴礼记》中收录的《乐记》十一篇是断取自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二十三篇,便出现了个问题,因为《小戴礼记》成书在汉宣帝之时,而刘向校书而得《乐记》在之后的汉成帝之时,如何在前的书反而是断取自在后的书?《礼记正义》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紧接着上段又给出了一个更正的说法:

“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总存焉。”(《礼记正义》)

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小戴礼记》收录《乐记》的时间晚于刘向校书的时间?这种说法确实也有记载,《隋书·经籍志》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然而此说颇受后人攻击,如清代毛奇龄《经问》曰:“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乎?”于是这种“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多被认为是妄说,然而大、小戴的生卒年不详,只知曾参加宣帝时石渠之会,史料之间的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并不容易作出定论。

#### (八) 背景八

现存《乐记》从这些相近的文字的比较要必定得出谁抄袭谁的,难以让人信服。

### 三、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乐记作者问题的争论离不开以下五种著作:

①失传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公孙尼子是先秦诸子之一,以传易而名,擅于论说性情,很可

能深知乐之义理。两句辑录的文字与现存《乐记》的文字基本相同。

②失传的河间献王的《乐记》——采集自《周官》及先秦诸子言乐事者,由内史丞王定传给王禹。

③现存的《小戴礼记》的《乐记》(十一篇)——记乐之义,与《吕氏春秋》《易经》《荀子·乐论》有相近的文字(与《吕氏春秋》有两段,与《易经》有一段,与《荀子·乐论》相近的文字有数段达七百余字,与存见的《公孙尼子》有两句相同。但却不见《乐记》有和《周官》相近的文字)。《小戴礼记》来自百三十一篇的《礼记》,孔子的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梁朝的沈约曾说《小戴礼记》中的《乐记》取自《公孙尼子》。

④失传的王禹献的《王禹记》(二十四卷)——来自河间献王的《乐记》(但两者之间不知能不能画上等号)

⑤失传的刘向校得的《乐记》(二十三篇)——不同于《王禹记》。《礼记正义》一说《小戴礼记》中的《乐记》十一篇断取自这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另一说刘向《乐记》是《小戴礼记》中的《乐记》十一篇另外增加十二篇而成。

刘向校得的《乐记》二十三篇、河间献王的《乐记》、王禹献的《王禹记》二十四卷、《公孙尼子》《小戴礼记》中的《乐记》十一篇,这五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中没有太大争议的是《王禹记》来自河间献王的《乐记》,刘向的《乐记》和《王禹记》不同(何种不同亦不清楚),另外就是刘向的《乐记》包括《小戴礼记》中的《乐记》十一篇,另外再有十二篇。除此之外,历史久远,资料记载不详,难以道明。以推理而言,可能性又非常之多,不可胜数。比如河间献王的《乐记》可有从《公孙龙子》中采集内容?若有,采集了多少?刘向校得的《乐记》二十三篇,是他发现就有《乐记》这么一本完整的书,还是他多处采集来凑成一本书的?……

本文认为对此无需继续探讨下去,因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这五种著作的内容又是来自何处的?从前面对学术背景的论述可以知道,不管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五者都无一例外是取自于诸子(或于六经亦有所取),而诸子之流皆源自六艺,六艺归一于王者的治世之道。由此可知《乐记》的核心在于“治道”。虽然其中的知识在流传中也许会发生文本上的变化,而且还可能破碎、丢失、或者增益,然而这正是使得以“治道”为中心要义的对《乐记》思想进行挖掘和整合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乐记》所要表达的礼乐之道正是一序和一,序和之道于治无不贯通,既可用于治理声音,又可用于治理人之情感、

人之身体，还可以用于治理百姓，进而治理天地万物，使得一切归于和谐。

#### 注释：

- ① 晋代陶潜《圣贤群辅录》曰：“八儒：夫子没後，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居环堵之室，华门圭竅，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有说此书非陶潜所作，然其究竟何人所做，无关紧要。
- ② 见蔡仲德《〈乐记〉作者辩证》一文，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一书。
- ③ 阴阳之声：阳声六，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六，为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阳声为律，是为六律；阴声为吕，是为六吕。

- ④ 五声：宫、商、角、徵、羽。
- ⑤ 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 ⑥ 六诗：《诗》的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郑玄注：“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也。颂之言颂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 ⑦ 鲁昭公十七年秋，剡子来朝见鲁昭公，孔子听说剡子是少皞氏之后，颇能知晓少皞氏以鸟名官之义，且详知少皞氏诸官之制，往而学之，然后才发出这一感叹。
- ⑧ 这里的六艺可能指礼、乐、射、御、书、数这“行之六艺”，也可能指诗、书、礼、乐、春秋、易这“理之六艺”，然而此处用“身通六艺”，很可能是指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孔子读易经、作春秋是晚年之事。

#### 参考文献：

- [1] 百子全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New opinion on author problem of *Yueji*

XIAO L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Yueji*, The classic chapter on music and harmony in Six Classics, which discussed the principles of music and harmony, is considered as the classic on aesthetics by most people, and scholars also research from it the sociology though before Qin Dynasty. But when it comes to who is the author of *Yueji*—GongsunNizi or King Xian of Hejian, or somebody else,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because of lacking of convincing proofs. By discussing the meanings and the spread of Six Classics,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roduce a wider and deeper context to clear up the main opinions on authorship and find out the core thought of *Yueji*, which will lead to a special emphasizing on Principle of Administer and make the authorship nonsense.

**Key Words:** *Yueji*; six classics; principle of administer; GongsunNizi; King Xian of Hejian

[编辑：颜关明]